

左 联 漫 忆

任 钧

“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间。

由于我曾是太阳社的成员，而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当“左联”成立时是全部参加的，所以“左联”一成立我就算是盟员了。

可是，当“左联”在上海宣告成立时，我还在日本东京读书，因而并未参加成立大会，只是其后在东京跟华蒂（叶以群）等几个同志搞了个“左联分盟”，一面跟国内经常取得联系，一面在国外进行了些活动（关于这，我打算在后面谈及）；直到1932年上半年离开日本回到祖国以后，才开始在上海参加了“左联”的工作。

我们知道，作为党领导的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团体的“左联”，成立并活动在蒋介石“四·一二”背叛革命后的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空前剧烈斗争的十年内战时期，也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存在着“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新民主主义论》）的时期，其历史条件和斗争环境是异常艰苦的。

可以说，“左联”始终是在极端疯狂、极端野蛮的白色恐怖网罗中，完全法西斯化的文化专制主义高压下奋勇前进的！

鲁迅在《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说：“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实。……但也正因为更加坚实而有力了，就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压迫和摧残”。（1958年版《鲁迅全集》（4）第237页）

这是曾经身受其害的鲁迅给我们留下的关于这方面的最为有力的“证言”！

那末，这种“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压迫和摧残”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以下仅就个人的所见所闻以及所了解到的一些有关资料，略加叙述。

总的说来，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屠杀和迫害作家：

如前所述，“左联”原是党所领导的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团体。因此，1930年“左联”宣告成立时，“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一卷三期）曾在“国内外文坛消息”专栏内公开登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这一则报道，并开列出鲁迅、蒋光慈、夏衍、冯乃超等等好

几十个参加成立大会的盟员的名单；但是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文化“围剿”越来越疯狂、越野蛮，“左联”也就由公开变成半公开，乃至完全变成了地下组织，变成了正象不久前周扬同志对一个华裔的外国新闻记者所说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左联’就等于共产党，国民党抓到‘左联’的人，要枪毙的”。事实上，在“左联”成立前后，也的确有不少的革命作家被屠杀或残酷迫害。

1930年10月，“左联”姐妹团体的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员宗晖被杀害于南京。

1931年1月，“左联”五个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跟其它二十多位革命者在一个会议上被捕，2月7日被秘密枪决、活埋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

同年，另一“左联”作家冯宪章也受到迫害，死在牢里。

在“左联”五烈士当中，柔石、胡也频和殷夫，大家是比较熟悉的，李伟森和冯铿比较生疏。

李伟森烈士，一名求实，是党的政治活动家、翻译家。他曾先后担任过共青团广东省委的宣传部长和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过《少年先锋》和《中国青年》，并常常用“求实”的名字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文章。当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般多少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少年，都十分爱读恽代英、肖楚女和求实这三位先烈发表在这两个刊物上的有关青少年问题的文章。因此，当我在广东原籍读中学时，就很熟悉“求实”这位作者的名字；但直到他牺牲后，读到他的传记，才知道原来求实就是李伟森烈士。

冯铿烈士，又名岭梅，她是广东潮安县人。也是当我还在读中学时就开始读到她在汕头出版的《岭东民国日报》付刊上所发表的诗文。文章的署名是“岭梅女士”。当时在文坛上流行着一种风气，那就是凡是女作家写文章都喜欢写下“××女士”的署名，如“冰心女士”、“冯沅君女士”等等。那时候，她只有十七、八岁，但已发表了好些诗文。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

冯宪章是太阳社的诗人，出版过诗集《梦后》，并翻译过好些日本革命作家的作品。1928年他从上海到日本留学。1929年下半年，因在中国留日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被日本警察逮捕、囚禁，不久即被驱逐回国，居住在上海，从事译作，并参加革命工作。1930年3月，他曾出席“左联”的成立大会。可是，不久就在一次示威游行中被捕，关在租界中的牢狱里。当时，我还在日本东京，接到过他想办法从狱中寄出的信。他于1931年病故在牢里。

1933年5月，作家丁玲和潘梓年被特务逮捕，当时在场的诗人应修人烈士也在被追捕时跳楼牺牲。

同年7月，洪灵菲在北平（北京）被捕，不久就被秘密枪杀。还有诗人潘漠华（潘训）也在天津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而死。据说，潘是由于姚文元的叛徒父亲姚蓬子的出卖而被捕的。

应修人和潘漠华都是湖畔诗社的诗人。1922年，冯雪峰、汪静之，加上应、潘两位烈士，曾在浙江成立过“湖畔诗社”，并于同年4月由四个诗友合出过诗集《湖畔》。

洪灵菲是太阳社的作家、翻译家。“左联”成立时，他是被推选出来的七个常务委员之一。1933年，由于党的工作需要，他被由上海调至北平（北京）。到北平后，他仍抽空从事文学写作，并参加当地和天津的“左联”领导工作，直到不幸被捕、牺牲时为止。

1935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之一、卓越的文艺理论家、“左联”成立时的重要领导者瞿秋白同志也在福建被枪杀。

以上仅就知名的或比较知名的作家而言，其他人们不那么熟悉的作家或爱好文艺的青年，被无辜杀害的更加有的是！真是“杀人如草不闻声”！

至于没有被直接杀害、却遭受到长期或短期的牢狱苦刑和折磨的作家，那就不妨说是比比皆是，不足为奇了！如原创造社的彭康、李初梨；原太阳社的楼适夷、林伯修（杜国庠），以及潘梓年等同志都长期蹲过国民党监狱。

就拿鲁迅来说吧，尽管由于他在群众中威望很高，反动派毕竟有所顾忌，不敢对他轻易下毒手；但在“左联”时期，他也受尽了各种各样的迫害。1931年当柔石等被捕以后，他曾离家避难；1933年，当革命组织“民权保障同盟”的负责人之一的杨铨（杏佛）被特务暗杀后，国民党特务机关曾放出风声，说要在杨杏佛入殡这一天暗杀鲁迅等人；但他仍非常镇静，毫不犹豫地去看杨的殡，并且出门不带钥匙，充分显示出大无畏的硬骨头精神！

其次是查封或捣毁书店：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妄图阻塞革命书刊的流通和传布，还常采取极其横蛮无理的查封或捣毁书店的办法。

这种办法，大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不久就开始了。例如当时开设在上海北四川路虬江路附近的创造社门市部就是在1929年被查封的。1930年，搞戏剧运动的进步团体“南国社”也被反动当局查封。

到1931年，这股恶风就刮得更厉害了。1931年3月16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一号，曾登载过如下一则有关报道：

“四马路（按，即现在的福州路）……北新、群众、江南、乐群等书店忽于3月4日被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发封。……此次被封原因，据说因出售反动书籍所致。……又据传闻，谓当局将继续查封其它书店，店名未明。”

从这一则新闻报道，也就不难推想到，反动派当时是如何滥用权力，横行霸道！查封了一大批不够，还准备继续蛮干下去！据说，最高的记录是一天查封了五家书店！

那时候，只要你是个喜爱跑跑书店林立、有“文化街”之称的四马路的“老上海”，大概都不会忘记：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白色恐怖弥漫祖国大地的阴暗日子里，是常常可以看见一爿又一爿的书店被贴上了盖着朱红大印的交叉封条、令人不胜气愤的情景的！

可是，大致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究竟是为了手续更简便、也更显得有声势呢，还是为了其它原因，反动当局对付书店的手法除查封外，又增加了一项新花样，那就是实行“捣毁”！用现在的词汇来说，也不妨称之为：打、砸、抢！

事情的经过，略如下述：

先是1933年11月12日，上海的艺术华影片公司由于曾摄制并发行进步影片，突然受到一群有组织有计划的便衣特务的袭击，被捣毁得一塌糊涂。临走时还散发一种油印传单，其中照例塞满了反共反人民的陈词滥调，最后的署名是“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

这种破坏行为，很快就转向到书店方面。

当艺术华影片公司被捣毁的第二天（11月13日），开设在北四川路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突然给一名特务用铁锤把该店门市部价值两百块银元的大玻璃橱窗击破了。

11月30日，开设在河南路五马路（按：即现在的广东路）口的神洲国光社总发行所也被捣毁，损失惨重。其经过情况几乎跟艺术华影片公司如出一辙。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大玻璃橱窗被击破的当天（11月13日），有一个自称为“上海电影

界铲同志会”还向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各书店发出了一封“警告信”，要他们对于鲁迅、茅盾、沈端先（夏衍）、钱杏村（阿英）及其它“赤色作家”的作品以及剧评、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得刊行、登载、发行；“如有不遵，我们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决不宽假！”云云。

此次受到他们捣毁的除艺华影片公司和良友、神州国光社等书店外，开设在虹口天潼路，承印美国人伊罗生编辑的、具有进步倾向的《中国论坛报》的勒佛尔印刷所，也被特务侵入袭击，遭到损失。

上述“警告信”，除书店外，也发给了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报馆。

同时，上海全市的大小电影院还在11月15日接到该“同志会”特地写给他们的另一封“警告信”，要他们“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云云。

尽管当时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封锁得非常严密，但反动派在捣毁、摧残文化事业这方面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多少也曾被透露了出来。而且，感谢鲁迅先生还特地在《准风月谈·后记》（1958年版《鲁迅全集》（5），第307—338页）里把有关报道剪存了一批。欲知其详，不妨加以参阅。

第三是禁止书刊的出版和发行：

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书刊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一贯怕得要死，恨的要命；因此制定反动的“出版法”，成立所谓“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它们的出版、发行横加种种阻挠和限制，还常常任意扣上“言论过激”、“宣传赤化”等等“罪名”，加以禁止。

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被他们查禁的书刊达二百二十八种；1934年，光是被他们查禁的文艺书籍就达一百四十九种；由1927年至1936年被他们查禁的各种社会科学书刊多达六百七十二种。

“左联”出版的机关刊物如《萌芽》、《文学月报》、《北斗》、《拓荒者》等等都先后被迫停刊。

在1934年受到查禁的、牵涉到二十五家书店的一百四十九种文艺书籍当中，凡是为广大读者所欢迎、销路较好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或论文集自然是“在劫难逃”，连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家的作品也“一视同仁”，无法幸免。高尔基、卢那却尔斯基、法捷耶夫等等固然是“罪有应得”，连梅特林克、梭罗古勃等等，也在查禁之列。

这其实也用不着奇怪，因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如此：凡书的封面印成红字，或是只要作者是俄国国籍，那就连契诃夫或安特列夫的作品也将被一网打尽，毫不容情。其结果，就使得号称“文化街”的上海四马路的大小书店的橱窗或书架都只好唱“空城计”，或至多摆上一些教科书和专门以小学生为对象的童话、故事之类的“小人书”。其景象是相当凄惨的！

在这次受到查禁的一百四十九种文艺书籍当中，以鲁迅、蒋光慈、茅盾和郭沫若四位作家的作品为最多；鲁迅共计十一种，蒋光慈跟鲁迅相同，茅盾共计十种，郭沫若九种。

革命作家蒋光慈是于1931年下半年去世的。实际上他的全部著译早在他去世前就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禁止发售，那里还用得着等待到1934年！这只是重新把禁令正式宣告一次而已！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使得一直靠卖文过活的他，在去世之前，完全没有了版税和稿费收入，在经济上陷进了无以为生、无以为医的困境！最后，病情已经恶化到不能不进医院

治疗的程度，好不容易向过去曾经出版过他不少著作的书店负责人商借到几十块钱，改名换姓住进了医院，不久就在贫病交迫中与世长辞！

可见割断革命作家赖以生活的来源，使他们面临蒋光慈在去世前一般的悲惨处境，显然也正是反动派所以要查禁革命书刊出版、发行的目的之一！其用心真是险恶之至！

如上所述，我们不难体会到，说“左联”曾经“受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压迫和摧残”，是丝毫也不夸张的！可是，由于真理和正义始终在我们这一边，由于有党的坚强领导，由于始终跟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其结果，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战士们，始终能够披荆斩棘，突破重重困难，把革命文化运动从胜利推向胜利！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这一时期存在着“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以后，接着说：“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最后毛主席还向我们提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说：“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是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1958年版《鲁迅全集》（4）第221页）一文中也说：“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卑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

毛主席和鲁迅的话都很可以说明：一直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奋勇前进的“左联”时期的革命文学运动，的确取得了非凡成就，并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二

前面提到过，我是在1932年上半年离开日本回到祖国来的。

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我找到了玲同志，跟“左联”接上了关系。她当时是“左联”的党团书记，对“左联”的工作管得很多，抓得很紧，好些会议她都参加，也常常跟盟员联系，找他们谈话。她是够忙的了。

回到上海后不久，记得我曾参加过一次好像是《北斗》杂志的编委会。该刊是由潮风书店（这书店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了）出版的。开会的地点就在该书店的楼上。参加会议的，除了玲外，还有华汉（阳翰笙）、钱杏村（阿英）、冯雪峰等等。会上讨论了有关《北斗》杂志的内容和其它。我简单地谈了谈当时日本左翼文坛的一些情况。我之所以被邀出席参加这次会，大概是由于我刚从日本回国之故。

当时“左联”内部设立了一个负责组织和领导盟员搞创作的“创作委员会”。回到上海后，我很快就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左联”盟员中许多从事创作的同志，如沙汀、叶紫、杨骚、穆木天、蒲风、周文、何家槐等等都曾经参加过该委员会。该委员会经常研究和鼓励盟员开展创作活动，并对“左联”成员所写作品进行评论，好的推荐发表，差的就提出修改意见。该委员会也开始研究和讨论怎样跟工农群众联系、怎样培养工农通讯员和工农作家等问题；但许多都

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探讨，还没有加以实践。这是受到当时困难环境和主观条件所限。

1932年下半年，参加“创作委员会”的几个写诗的“左联”成员杨骚、穆木天、蒲风以及本人，鉴于当时的诗坛，较有影响的是徐志摩他们的“新月派”和戴望舒他们的“现代派”，并且在诗歌创作上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新月派”）和“象征主义诗歌”（“现代派”）的口号和主张。我们不能同意他们的口号和主张，因此，就发起组织了作为“左联”外围团体的“中国诗歌会”。1933年初还创刊了《新诗歌》作为这一团体的机关刊物，批判和反击了那些资产阶级诗歌流派和它们的创作思想，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大众诗歌”这一创作口号。在当时的民主革命阶段里，“中国诗歌会”的成员们就是在这一口号下，创作出一系列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而在表现形式上又尽可能做到比较通俗、易懂的大众诗歌的。鲁迅当时对于它的存在也表示关怀，曾一直给予积极支持和指导。

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可能是在1933年的下半年，“左联”在北四川路底一家饭店的楼上，用聚餐会的形式，召开过一次有关创作问题的座谈会。出席参加的计有沙汀、艾芜、杨骚、周文、叶紫、林焕平等十多个人。茅盾先生也到了。那时叶紫已经在刊物上发表了包括《电网外》在内的几个短篇（后来它们都被编进题为《丰收》的短篇集里），引起了大家在会上热烈展开讨论，茅盾先生也发了言，一致认为写得不错。其间还谈到了些其它跟创作有关的问题。由于在当时白色恐怖极端严酷的环境下，象这样参加人数较多的会议是难得召开的，所以还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933年5月间，丁玲、潘梓年等同志被捐，“左联”党团书记职务也改由周扬同志担任。从此时起到1934年上半年，我也参加了“左联”的部分领导工作。当时行政方面的分工如下：由周扬同志兼任行政书记，我负责组织，胡风（张光人）负责宣传。“左联”党团（党组）由“文委”领导。党团成员三人。除担任党团书记职务的周扬同志外，还有林伯修同志和我。林伯修后来用“杜国庠”的名字写作有关历史研究方面的文章和书，这是他原来的姓名。他是太阳社成员。“左联”成立后，他也参加了。此时他是代表“文委”来参加“左联”党团的。作为文学工作者，他是翻译家，曾经翻译过好些日本进步作家的作品。解放后，他担任过广东省文教厅厅长职务，已于文化大革命前去世。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他在解放前曾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就被“四人帮”打成了“叛徒”，听说连坟都给挖了。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得到平反昭雪。

由于我在“左联”领导部门工作过，所以解放后有些年轻同志有时就不免向我打听：“左联”当时的办公地址在哪条马路？甚至还问到当时的工资待遇，等等。显然，这些同志是在用解放后的情况来设想过去。实际上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斗争环境下，我们那里能有什么办公地址呢？就拿“左联”党团来讲吧，当年座落在霞飞路（现在的淮海路）上一个小弄堂内的一间狭小的过街楼上的周扬同志的家，就是我们经常碰头、开会的唯一地点！“工资待遇”么？那更是连听也没有听说过！就拿周扬同志来说吧，一家数口，全靠他卖文过活。但由于稿酬低，也由于工作忙，抽不出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结果，生活上自无法宽裕。有一次，一个孩子害上了严重的肺炎，经医生诊断，认为应立即住医院治疗；但要住院就必须先行预付一笔住院费用，而他一时又筹不出这笔钱，真急煞人！后来还是靠穷朋友设法凑了些钱，才让孩子住进了医院。

由于这一时期“左联”所处的斗争环境越来越险恶，所以，鲁迅、茅盾尽管居住在上海，但都不参加“左联”的一般性活动。因此，我们总是不定期地约好时间、地点，跟他们碰头，向他

们汇报工作,征求意见,讨论问题。碰头的地点大抵是在北四川路一带的饭馆里,用聚餐的形式,边吃边谈。几乎每次都由鲁迅先生破钞。我们颇觉过意不去,建议由大家分摊;可是,他老人家总是不同意,并且异常和蔼地笑笑说:“我的稿费收入毕竟比你们要多一点呀!”

除上面提到过的“创作委员会”外,“左联”内部还设立了“大众文学委员会”和“理论研究委员会”等。

参加“大众文学委员会”的成员有吴奚如、艾芜、徐平羽、彭柏山,等等。吴奚如和艾芜都曾经是负责人。该委员会经常结合各个革命纪念日,如“五一”、“五卅”等,搞些面向工农大众的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宣传小册子,散发出去;并通过组织,跟一些工厂取得联系,到厂里去办读书班、夜校、补习学校等等。艾芜同志就曾到杨浦区的工人住宅区去办过学校,白天教工人子弟,晚上在工厂补习学校上课,并在学生中物色对象,发展工人通讯员,修改他们所写的稿子,介绍到刊物上去发表。可以说,艾芜同志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理论研究委员会”,顾名思义,是搞革命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和写作工作的。成员有任白戈、林焕平等。但还有哪些人以及做了哪些具体工作,等等,却记不清楚了。

“左联”成员,每一、二个星期,都要参加一次小组会。小组是依据成员不同的居住地区来划分的,如市中区小组,北四川路区小组、法南区小组,等等。由于“左联”没有办公地点和固定活动场所,大家只好利用公园、饭馆或其它公共场所开会,有时也在某一成员的住所里开。会议的内容不固定,除传达一些文件或通知外,政治形势、文艺问题、创作问题,都可以谈,或展开讨论。

由于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所带来的种种困难,我们尽量少发书面的东西,一般都通过口头来传达或通知。我们也避免召开人数众多的会议。不同小组的成员,倘无工作上的需要,也不发生横的关系。一句话,就是:基本上搞地下活动。其结果,自不能不大大地限制了作为群众文艺团体和“左联”所应具的群众性的发挥。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当时特殊环境所造成,可是在另一方面,作为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组织的“左联”,显然也不可避免地曾受到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某些影响。

还有,在“左联”成员的活动方式上也很容易看到这方面的影响。如所周知,当时“左联”成员,每逢革命纪念日,或配合救亡活动,都要参加写(或贴)标语、发传单、或搞飞行集会等等。写(或贴)标语有时还有指标,规定每人或每一小组起码得写(或贴)多少条才算完成任务。这种把“左联”这一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团体当作“第二党”或跟一般群众组织等同起来的错误做法,不但使“左联”无法发挥革命文艺所具有的特殊宣传、教育作用,也使得我们在人员和组织方面受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和破坏。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同志,对于这种过左的搞法也颇不以为然;但由于党的威信很高,而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又很有限,也只好照办,并未提出不同意见。

另外,由于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左联”在发展盟员方面也有着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倾向,没有吸收广大的作家,特别是一些进步的、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因此,“左联”的成员大都是新作家,以及一些刚刚开始写作的文学青年、大学生,等等,老作家占的比例很小。我在“左联”工作的一段时期,经常参加活动的成员只有五十多人。尽管已有少数工农通讯员正在被加以培养,但当时还没有工农出身的作家。

当周扬同志接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时候,原“左联”党团书记阳翰笙同志已调到“文

委”担任书记职务。夏衍、郑伯奇、阿英、田汉等也已调走，实际上已不在“左联”工作。

最近有同志问到我：“第三种人”苏汶（杜衡）有没有参加过“左联”？因为他曾看到有的“左联”老同志在有关的书面材料中提到过这个问题。

据我所知，这一问题，从丁景唐同志所写的一篇题为《关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见《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一文所引用材料来看，是肯定的。不但苏汶曾参加过“左联”，戴望舒也参加过。

最近看到施蛰存同志关于《现代》杂志及其它的谈话记录，其中也完全肯定苏汶和戴望舒都参加过“左联”。

据我所了解，“左联”存在的时间虽然并不怎么长，但由于种种原因，成员的情况却常有变动。有的人最初曾经参加，可是其后却离开了；有的人原在“左联”工作，但后来调走了……总之，其间变化是颇多的。如今，且凭个人记忆所及，把我在“左联”工作期间所知或多少有过接触的、当时仍在参加“左联”活动的盟员名单开列于后，借供参考：

鲁迅 茅盾 周扬 林伯修 丁玲 沙汀 楼适夷 艾芜 杨骚 任白戈 周立波 欧阳山 草明 白薇 白曙 林焕平 周而复 田间 苏灵扬 柳倩 蒲风 关露 叶紫 韩起 何家槐 周钢鸣 胡风 周文 方土人 沈起予 庄启东 王尘无 汪汉雯 吴奚如 徐平羽 彭柏山 方之中 丘东平 彭慧 祝秀侠 叶以群 尹庚 穆木天 聂绀弩 梁文若 雷澹波 谭林通 金丁 李辉英 杜谈 任均 石灵 覃静子

三

不久前在《新文学史料》第三辑上面看到林林同志所写的回忆有关“左联”东京分盟及其三个刊物的文章，不禁使我联想到1930年“左联”成立后，我跟华蒂（叶以群）等在东京亦曾搞过一个分盟的事情。

现在，我打算捎带在这里简单地谈谈当时的情况。

1930年“左联”在上海宣告成立后，华蒂也从国内来到东京。当时我们一则为了跟“左联”取得经常联系，以便互通消息，不致跟国内文坛疏远、隔绝；二则也借此可以跟日本的革命文学团体“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及其所属进步作家取得联系；于是，我们就邀约当时也在日本留学的谢冰莹等在征得国内“左联”负责人的同意后，成立了小小的“左联”东京分盟。

叶以群，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位文艺理论家。我在日本留学时，曾和他合译过高尔基的小说《隐秘的爱》，由湖风书店出版。后来，他还出版过好些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受“四人帮”迫害，含冤而死。

谢冰莹，女作家，湖南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所办的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当过“女兵”，打过仗。后来写过《从军日记》，最初在报纸上发表，后出单行本，曾经广泛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抗战期间的四川重庆，其后就一直没有跟她碰过头。听说她已于抗战胜利后到台湾去了，以后就从未听到过有关她的任何消息。

记得分盟最初是通过蒋光慈、钱杏村，后来是通过楼适夷或丁玲跟上海“左联”取得联系的。

分盟成立时，我们曾经打算跟当时住在千叶县乡间的郭老(郭沫若)取得联系，并希望得到他的指导。可是，我们总觉得这团体究竟太小了，不便去惊动他；更重要的，就是我到日本后不久曾特地到乡间去拜望过他，了解到作为政治流亡者住在异邦的郭老，一直有日本警察去“访问”，行动并不自由，诚恐因此给他招来额外的麻烦，所以终于没有这样做。但后来在跟他通信时，我曾向他提过这件事。他表示关心和支持，并要我们多加警惕。

分盟成立后不久，我们就很快跟“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取得了联系。

原来我们在1929年就认识了一位日本的“中国通”藤枝丈夫君。同年下半年，当蒋光慈来到东京时，曾通过他的关系跟“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发生联系；因为他同时也是该同盟的成员。

跟该同盟发生联系后，他们就邀请我们参加了他们所召开的一些会议。我们在会上向他们介绍了中国进步文艺界的现状及其斗争情况，等等，很受他们的欢迎。同时，我们还把从国内寄来的刊物，如《拓荒者》、《文艺新闻》，等等，赠送给他们。

稍后，我们还参加了该同盟所属的诗人们的集会，出席参加的有森山启、上野壮夫，等等。他们在会上讨论有关诗歌的一些问题，并朗诵他们自己新写的作品，气氛很热烈。我跟华蒂也在会上发了言，介绍祖国当时革命诗歌运动的进展情况。记得为了表示跟国际友人一起活动，我还将自己写的一首题为《我听见了飞机的爆音》（该诗曾在丁玲同志主编的《北斗》杂志上发表过）的诗翻译成日文在会上朗诵过。后来该诗被发表在他们所办的诗刊上，还跟日本诗友们的作品一同被编进一本以反侵略为主题的诗集里。

我们不但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一些集会，还分别访问了秋田雨雀、小林多喜二、德永直、村山知义、森山启、中野重治、洼川稻子，等等。

以上所列举的，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活跃在当时日本左翼文坛的知名作家。如秋田雨雀，他是个老作家，曾访问过苏联，可以说是老一代的进步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早就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小林多喜二写过著名的《蟹工船》。该书在日本出版后不久就被翻成中文，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他是当时日本共产党的党员作家，曾担任党内高级职务。在1933年2月被捕后，很快就被日本警察杀害，死得很惨，遍体都留下内外创伤。小林英勇牺牲后，为了表达中日两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深厚情谊，“左联”发表了《为小林事件向日本政府抗议书》；鲁迅也给他的家属发了吊唁的电报。同时，还由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陈望道、洪深、田汉、丁玲等人联合发表《为横死的小林遗族募捐启》，载同年五月十五日北平（北京）《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德永直写过著名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是个印刷工人出身的作家。这部长篇也曾翻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村山知义是个剧作家，曾写过许多剧本，其中有一部取材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名为《胜利的记录》。该剧写成后曾在东京上演，我们曾去看过。森山启和中野重治都是诗人，洼川稻子是女小说家，他们的作品都曾先后被译成中文，对于我国当时的读者并不陌生。

我跟华蒂在访问了这些作家之后，曾分别写过一些“访问记”，在当时上海出版的报刊上发表。譬如1931年11月9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三十五号就曾刊出过我们所写的访问村山知义的记录，并在该文的“前记”里说过如下的话：“我们以后，假如不会碰到什么意外的话，打算在《日本新兴艺术家访问记》的总题目下，连续把此类的作家访问记发表下去。……”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访问记并没有在《文艺新闻》上继续登载出来，只是在其它报刊上发表了一部分。不过，究竟是哪些报刊，如今也记不清楚了。

我们对这些作家的访问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夕进行的。那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一贯对外采取卖国投降政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矛头，已经日益明显地对准我们祖国；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面，全国各地亦已不断地卷起反帝、反日、反侵略的浪潮。这样，中日两国之间，已经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难能而可贵的是：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我们所访问的这些富于正义感的日本作家朋友，当年都持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进步立场和观点；因而他们跟我们谈话时，毫无例外地，都表明了他们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和同情中国人民反日、反侵略的正义行动。这种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革命友谊，不但当时曾使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而且直到现在也还留下深刻印象，记忆犹新！

我们当年在东京成立的“左联”分盟，活动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左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由于叶以群和谢冰莹等人都先后离日回国，分盟也就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1979年，夏，于上海。

附记：以上这篇回忆录，是在去年夏天写下的。其中第三部分，关于“左联”东京分盟，我只是主要地记述了它跟“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及其所属部分作家联系方面的一些情况；其它方面，由于时间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而个人的记忆力也越来越不行，有好些事情实在记不起来，只好从略了。

最近，原“左联”老战友、现在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文联工作的尹庚同志托朋友转寄来了一篇记述叶以群同志与“左联”东京分盟关系的文稿给我，要我提些意见。这正好为我这篇东西作了些补充。尹庚同志当时也在日本东京，和以群住在一起。尽管那时候他还没有参加“左联”，但通过以群，他对“左联”分盟的情况是颇为了解的。据尹庚同志在文稿中说，当时参加分盟的成员共有十来个人，除以群和我等几个人外，还有胡风、聂绀弩等同志。“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中国留日学生们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为了集中力量，团结对敌，当即成立了包括“左联”分盟在内的“文化总同盟”，还出版过油印刊物，名叫《文化斗争》，等等。

兹特将其中有关“左联”分盟的一些情况，摘记如上，借供参考。

1980年，夏，附记。

我院举行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

我院文科专业一九八一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现正陆续举行。

这批研究生是粉碎“四人帮”后入学的，经过二至三年的刻苦学习，在各自的专业上都取得显著成绩，毕业论文质量比较高。从已经答辩的论文来看，大多数材料丰富，观点鲜明，具有某些新意。有的论文条分缕析，纠正前人之失，有较高学术价值，受到专家的赞许。

院领导对答辩会十分重视，各项工作均按中央教育部有关规定严格进行。研究生毕业论文完成后，先由导师审阅，写出学术评语，报系学术委员会审查，经同意后才能进行答辩。答辩委员会聘请院内外学术造诣较深的专家组成。委员们先行审阅论文，提出问题，答辩会上一一提问，研究生作出回答。答辩结束后，答辩委员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和评定答辩成绩。然后以无记名方式投票，决定是否通过论文；是否已达到硕士水平，建议授予硕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是学校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领导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目前正按照计划顺利进行。